



# 杜甫的暗号

——诗圣牵带出的唐史研究

■ 王炳文

▲ 南宋·赵葵《杜甫诗意图卷》 上海博物馆藏

诗圣杜甫的名字,对于每个中国人都并不陌生。我们在孩童时期就被“两个黄鹂”启蒙,长大一些后又在课堂上诵读过“国破山河在”,知晓《石壕吏》和《秋兴八首》。时光变迁,代际嬗替,在无数读者的心中,生出了一个颠沛流离的瘦弱形象,却与真实的杜甫逐渐远去。人们崇尚他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但又对这个高度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倍感疏离。推开自宋以降浩繁的卷帙,我们恍忽间发现,对于杜甫的真实人生,我们其实所知有限。“千家注杜”的盛况之下,是对杜甫生命史的忽视。这个生命史,并不仅仅指杜甫本人的生命历程,还包括他所看到的历史景象,以及他所关涉的历史暗流。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则是杜甫前四十四年的人生。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杜甫存世诗作的分布特点不无关系。杜甫流传下来的诗歌大约有一千五百首,如果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把杜甫五十九年的人生分成前四十四年和后十五年两个阶段,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绝大部分创作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占去杜甫七成以上生命历程的“前半生”,直接对应的诗作反倒极为有限。《旧唐书·文苑传》将杜甫归入“天宝末诗人”,仅记其安史之乱后的事迹,已然为后世读者对杜甫生命史的认知定下大致基调。千百年来,人们谈论最多的,仍然不外乎草堂、夔州、湖南以及“三吏三别”这些固有的意象与符号。

历史人物的事迹普遍存在前期简略而后期详实的特点,并且史料记载往往堆叠于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上。这是宏大历史叙事投射到个体之上的必然结果。再造大唐的郭子仪,在《旧唐书》的列传里被归为代宗朝人物。代宗是玄宗的孙子,他即位时安史之乱已行将结束,而郭子仪早在玄宗朝末年就是朔方军高级将领,一手肇建了唐后期北方重镇天德军的创建。将他列入代宗朝大臣,是因为在官方的历史建构中,郭子仪属于中兴之臣。这位生前便已位极人臣的历史人物,归根结底仍然是宏大叙事中的一个要素,他人生前五十九年

(安史之乱爆发时郭子仪已五十九岁)的事迹,在正史的模式下并无意义。相较于郭子仪,杜甫在现实中的权势与地位几乎无从谈起,在唐朝国史的叙述中,他的行状更是被浓缩为救房琯、佐严武几件事,无非是大历史的一个注脚。而这些有限的“注脚”式事件,其实也湮没在了历史的大潮下,很难显露出真实的事件脉络和内在因由。传统的叙事模式加上存世诗作的分布特点,使得杜甫的个体生命史尤其偏重于人生最后十五年。但对生于712年的杜甫而言,他是不折不扣的玄宗朝同龄人,他的历史形象与实际人生间存在明显的偏差。探寻杜甫早年的生命史,需要回到杜甫及其家庭、家族之中,而杜甫在他的诗里,也确实为我们留下了无处不在的各种“暗号”。这些暗号包含了人物的关系、事件的因緣以及时代的指向。对它们的解读,足以打开一个完全不同的杜甫生命史,重绘杜甫早年的历史图景。

这种重绘,首先是把杜甫放回到中古士族的家庭中去。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一生有两次婚姻,共有四男五女。他的父亲杜闲同样有两次婚姻,生了五男一女。两代家庭从规模来看,都与现代史学研究得出的唐人“五男二女”家庭模型颇为吻合。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相比,中古家庭在内部张力与外在形式上都有明显不同,然而,家庭之于人的意义却未曾改变。杜审言死于中宗复辟后的景龙年间,那时杜家的命运一如朝中政局般变动不定,两年后杜闲初婚,但他的原配夫人杜崔氏在生下杜甫后便溘然长逝,随后的续娶夫人小杜卢氏,其实是杜闲继母老杜卢氏的娘家。在继母老杜卢氏和长子杜闲的共同维持下,杜家渡过了杜审言死后的家庭危机,避免了过早分家,以唐代常见的“同居共爨”的大家庭模式存活了下去。这个庞大的家庭在开元十年左右,随着杜闲最小的孩子杜占的出生而最终稳定下来。这是杜甫出生和幼年成长的现实环境,也是探讨他早年内心世界的关键。

强调家庭在杜甫生命中的重要性,需要复原他的生活环境,析出家庭生活中的伦理和经济两重要素。中古士族本就重视姻亲,身为士大夫的杜甫,他最初的社会关系同样是由此规划的。由于生母早卒,出生不久的杜甫被寄养在二姑母小裴杜氏家中,和裴家刚出生的男孩一起接受哺育。在两个孩子同时生病的情况下,小裴杜氏选择保全了杜甫,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多年后杜甫为已故的小裴杜氏撰写墓志,盛赞为比肩古人的“义姑”,实具深意。与杜家类似,裴家的婆媳两代也是同宗,小裴杜氏嫁给了裴家长子裴荣期,她为保全娘家侄子而失去的这个男孩,本应是裴家长孙。此事在婆婆老裴杜氏心中无法释怀,老裴杜氏人生的最后岁月选择了跟随次子裴昌期生活,甚至卒于次子官舍。但即便如此,裴家仍然与杜家保持了长久的互助关系,杜甫为二姑母服丧并撰写墓志,从根本上看是对杜、裴两个家族代际往还的肯定。这种基于家族与家庭的人伦宗亲因素,遍布于杜家整个亲缘网络,对杜甫的成长至关重要。相关研究不能仅满足于梳理姻亲关系,而是要触及亲缘背后的社会训力力量。

与或亲或疏的伦理关系始终相伴的,其实是家庭生活更为根本的经济考量。父亲杜闲对于杜甫前半生的影响,集中体现出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杜甫在初试不第后之所以能拥有“快意八九年”的青春时光,背后正是杜闲的经济支持。他著名的回忆体长诗《壮游》,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回忆,让读者产生了盛世壮游的虚幻感,甚至由此认为四处漫游是当时士人的一种风尚。事实上,杜甫自己就讲得很清楚了,叫作“黑貂不免敝”,家里的老本花光了,才去了长安。况且,杜甫也不是无目的地浪荡数年,其间行踪,其实是其父亲的仕宦轨迹,他是作为家属陪奉的。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明白杜甫死后杜家发生的分家剧变,以及杜闲陡然担负起家庭重担。凡此诸种,杜甫其实都给了读者充分的暗示。

如果我们顺着杜甫的这些暗号不断深究,就会看到他的诗中同样频繁出现的隐喻符号,由此进入他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其间有他的政治态度,也有心灵依托。这些大量存在的符号化隐喻,需要我们不惮繁地去比照与解读。

晚年杜甫在夔州别驾元持的府上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可以看作杜甫式隐喻的集中体现。他在欣赏了精妙的舞蹈后与舞者交谈,得知这位李十二娘是当初名动天下的公孙大娘的弟子,一刹那杜甫的思绪回到了开元五年,他随家人在郾城观看剑器舞脱舞的场景在记忆中重现。诗中的“开元五年”也有版本作“开元三年”,无论何种,它的功用其实是一种历史隐喻。彼时,宋璟取代姚崇成为宰相,政治气候由刚猛尚武转向温和崇文,对唐强硬的突厥可汗默啜死去,继位的毗伽可汗可汗对唐。四海升平,万象更新,开元盛世自此启幕。杜甫已经长到六岁,学会了用自己的双眼来观察世界。次年,他将赋诗歌咏凤凰,写出第一首完整意义上的诗歌。这是杜甫对他幼年生命架构的搭建,当我们把这些散落在他晚年诗歌中的暗号拼接起来时,会发现他对于玄宗朝政治的发展,其实有着自己独特而完整的认知。杜审言晚年在秘书省和国子监为官,属于武周以来中央政治里的“文学派”,与姚崇所代表的“吏治派”关系紧张。杜甫眼中的“开元全盛日”,其实是文学派如日中天的时代。而他“往昔十四五”出游的“翰墨场”以及“张旭等人的‘山阳会’”,同样是一种政治隐喻,那是玄宗封禅泰山的前夜,象征着文学派的极盛。

当我们把这种细致而微的生命史重新放置到时代中去,会发现很多问题变得更加深刻了。对于杜甫,我们总觉得他与他所处的时代存在种种关联,却很难说得清这种关联究竟如何真正产生。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都不是“两张皮”的状态。与郭子仪这样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物相比,杜甫确实微不足道;但相较于千千万万普通的唐朝

百姓,杜甫却无疑是“手可通天”的,他与文坛名流、当朝权贵甚至几任皇帝,都存在种种或深或浅的关联。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它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正史模式的微观生命史的绝佳案例。能够进入历史研究视野的人物,无论身份高下,总会存在一种权力关系。如何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人物放回他所应处的权力网络中,是微观生命史得以成立的关键。

杜甫一生经历了三位皇帝,而这三个人他都亲眼见过。天宝十载他曾获得“天子废食召”的殊荣,在中书堂上面试文章时或玄宗有一面之缘。安史之乱期间,他在肃宗身边任左拾遗,几乎每天都见到肃宗,同时也见到过当时尚为太子的李俶(即后来的代宗)。他写出“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这样直白描述官制关系的诗句,其实是他政治观点的一种表露。皇帝身边的近幸之臣中,早年的大常御姜皎、后来的驸马张垍都与杜家存在交往,杜甫赋诗赞美姜皎留在绵州的画迹,追忆他与张垍的“山阳之会”,都有昔年交游的深意所指。至于临晋公主和驸马郑乾曜,更是杜甫西入长安后的首任幕主。他在“三庶人”事件早已定性、杨贵妃已重新承恩宠的天宝五年,为临晋和鄂王李瑶的生母皇甫德仪撰写碑文,无异于选择站到李林甫反对派一方的阵营。至于朝中高官,杜家更是从杜审言开始便广为结交,具体因緣各有不同,但总体却秉持着文学派的政治立场。杜甫与李邕、贾至、严武这些人的交往,背后无不是两个家庭甚至家族之间的际际关系,而本人也从“李邕识面,王翰愿卜邻”的虚假光环中走出,逐渐感知到了“二年客东都”“朝廷故旧礼数绝”的社会现实,最终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杜家三代人人际圈,拥有了高适、李邕这些杜家前两代交际圈之外的挚友。他晚年寄语姨兄狄济的“干渴玉侯颜历晚”以及写给表亲李义“愿子少干渴”,怎么看都更像是写给少年时代的杜甫自己,他是在盛唐的红尘世界中广为结交却又踽踽独行的写照。

在个体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杜甫借助诗歌,筑造起一个远超自身活动范围的宏大世界。对一个唐代人来说,杜甫足迹所至已经足够广阔,东至齐、兖诸州以及江左、浙东,南至湖南,西至秦州、成都,往北及于鄜州、洛州。但在他的诗歌世界里,这个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到葱岭的雪山、交河的层冰、辽海的巨帆,以及交趾的丹砂和铜柱。杜甫诗中的殊方意象,大都源自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指向具体的人物与事件,其中既有世所熟知的历史掌故,更有仅此见过的原始记载。他曾在夔州亲历荆南水军溯峡而上直抵白帝城的甚嚣阵势,并被兵马使炫耀展示一把大食弯刀,由此写下“太常楼船声嗷嘈,问兵刮寇趋下牢”“白帝寒城驻锦袍,玄冬示我胡国刀”的奇险诗句,在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安史乱后荆南政局宝贵史料的同时,也展示出了唐朝社会高度发达的对外交流。这是杜甫历史性的更高层次的意义,突破了政治斗争与人事纠葛,反映出了整个时代的风尚与面貌。

考虑到“诗圣”所具有的普遍文化意义,以及“诗史”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价值,我们不妨承认,对于杜甫生命史的研究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微观的个体首先需要在宏大时代之下获得自身意义,然后才能在个体的视角下反观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生命史又何尝不是一种宏大叙事,只不过它的主线换成了特定的个体,注脚则是与之息息相关的整个时代。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纪念

# 记忆、回忆和文化记忆

纪念扬·阿斯曼

■ 金寿福

德国著名埃及学家和两位化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于2024年2月19日去世,作为他的学生,我在这里写几段介绍他的学术经历和成就的文字,以表达我对他的培育之恩的感激和敬意。

扬·阿斯曼1938年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朗格尔斯海姆,父亲是建筑师。他先后在海德堡、慕尼黑、巴黎和哥廷根学习古希腊语文学、古典考古学和埃及学。1971年,阿斯曼在海德堡大学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1976年成为海德堡大学埃及学研究所教授和所长,直至2003年荣休。2005年,他受聘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担任文化学研究方向的荣誉教授。

从阿斯曼的求学经历不难看出,一方面,他对希腊语的精通和在语文学领域的造诣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路径和学术生涯;另一方面,他的研究方向从希腊过渡到埃及。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一经历犹如希罗多德,出于对希腊以外世界的好奇和兴趣,开始探索埃及的历史和宗教,以理解和解构埃及与希腊及至后来的欧洲文化之间深远的历史渊源和错综的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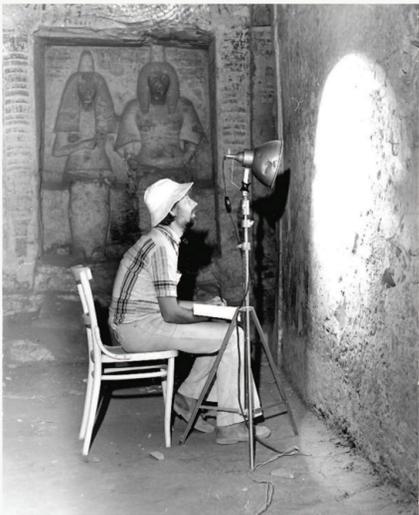
阿斯曼对卢克索官吏墓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研究,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一手文献。与传统的埃及学家不同,阿斯曼把文学和其他体裁的文献也纳入考察和研究范围。概观阿斯曼的著作,无论是翻译和注释原始文献,还是从历史、宗教、文化等视角进行阐释,其核心内容是记忆。可以说,古代埃及人的活动,大到国王建造金字塔,小到官吏们刻写墓碑,中心议题归纳起来无外乎两个,其一是如何得到后人永久的记忆和不断的回忆,其二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记忆先人,这里涉及生者与死者的互动。他不仅复原了古埃及人的记忆空间和回忆模式,而且还勾勒了古埃及文化在犹太及西方思想中的传承脉络。

在他之前的许多学者秉持着这样一种态度,将古埃及视为一具僵死的干瘪木乃伊,只能为今人提供一些值得惊叹或者聊以自慰的谈资。阿斯曼摒弃了这种态度,将古埃及视为人类早期文明中完成了从生到死全部过程的文化体,因而对研究其他古代文明和充分理解现代性的来龙去脉具有宝贵的借鉴作用和启发意义。《玛阿特:古埃及公正与永生之间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颠覆了古典作家和《圣经》编纂者建构的、将古埃及视为专制和奴隶制社会的错误形象,描述了古埃及社会如何在玛阿特这个包含公正、秩序和真

理等意义的原则下运转,众神、国王和民众三者又是如何依据玛阿特原则相互依赖和制约。

阿斯曼在海德堡大学埃及学研究所担任讲师的时候,认识了在海德堡大学读书的阿莱达。1968年,二人结婚,阿斯曼30岁,阿莱达21岁。1968年至1975年,阿莱达陪同阿斯曼在埃及卢克索进行考古发掘。

阿莱达的父亲是研究《新约》的著名学者,她的母亲也拥有神学博士学位,但婚后专注于相夫教子。阿莱达不想步母亲的后尘。她在海德堡大学的第一主修是英语语言文学,第二主修是埃及学。在阿莱达获得博士学位的前一年,他们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此后的几年,又有四个孩子陆续降生。1992年,阿莱达在海德堡大学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第二年应聘为康斯坦茨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共同追求学问的夫妇该如何应对事业、家庭和孩子,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阿斯曼夫妇知道,外界则将其当作一个传奇故事。尽管有保姆帮忙,阿斯曼当然还是要做许多家



▲ 1980年,扬·阿斯曼在底比斯第41号墓  
图片来源:海德堡大学埃及学研究所

▲ 《托马斯·曼与埃及:约瑟夫小说中的神话与一神教》(2006)

务活。他曾坦言,他可以很轻松地制作麦粉粥和意面,但在各种家务中,他最喜欢的是熨衣服,因为在做这项比较简单机械的工作时,他可以听古典音乐。

1978年,阿斯曼夫妇联合多位来自不同学科但志趣相投的学者,创建了一个学术丛刊,名为《文字交流的考古学》,旨在把文字和文本置于文化大背景中进行考量,不仅重视文本产生的具体社会环境,而且把视域扩展到文字和文学诞生的人类早期,以便更好地理解文字和文学对其创造者、使用者及其社会产生的影响。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阿斯曼夫妇共同演绎了“文化记忆”这个随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理论。他们认为,所谓文化记忆就是由官方机制化的、具有固定形式的集体记忆;换句话说,如同个体需要一个借以安身立命的记忆一样,一个社会借助文化记忆才得以在历史长河中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1992年,阿斯曼出版《文化记忆:古代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以下称《文化记忆》)。该书以古代埃及、古代以色列和古代希腊三种典型的文化记忆为

例,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记忆、身份认同、文化的连续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记忆涉及有关过去的知识,身份认同关乎政治想象,而文化的连续性则与传统的确立和维系相关。在1990年代欧洲政治剧变的历史背景下,《文化记忆》这部著作不仅构成了阐释和珍视过去的理论依据,而且为正确对待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历史范例。

阿斯曼把《文化记忆》献给了阿莱达。在题献中,他引用了但丁在《神曲·炼狱篇》使用的一个词组*il miglior fabbro*更加卓越的匠人。但丁用这个词组指称法语诗人达尼埃尔(Arnaut Daniel),认为他高超地运用了母语。著名诗人艾略特把他最有名的诗《荒原》献给了同样出名的庞德,并引用了但丁创造的词组,以表达他对庞德的谢意。根据人称的变化,阿斯曼把*il miglior fabbro*变为阴性形式*la miglior fabbra*,称阿莱达为比他更加卓越的匠人,他对夫人的敬意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考虑到但丁对欧洲人文主义发挥的巨大作用和他创造的这种表达形式在欧洲文学史上延续了700多年,阿斯曼把这个短语用在《文化记忆》这本书,无疑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文化记忆》出版之后若干年,德国国内尤其是历史学界出现了试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罪行辩解甚至否认的势头。阿斯曼夫妇积极参与关于在柏林建设大屠杀死难者的讨论和签名运动。1998年,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在颁奖典礼上,他发表的感言中暗含反犹主义立场,在德国引发轩然大波。阿斯曼夫妇勇敢地站出来,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武器,就德国历史学界和德国作为国家应当如何面对和应对二战时期的罪责著书立说,在大学、研究所、电台和电视台做演讲。他曾说到,尽管文化(Kulturen)、语言(Sprachen)、宗教(Religionen)都有复数形式,但是人类(Menschheit)却只有单数。

在童年时代,阿斯曼最大的爱好是音乐。在中学读书时,他谱写过康塔塔、奏鸣曲,甚至还写过歌剧。阿斯曼梦想成为音乐家。然而,在进入大学后,他先是选择了古希腊语文学和古典考古学,然后转向埃及学。2020年,阿斯曼研究贝多芬的专著出版。康斯坦茨报社的记者采访了阿斯曼,在谈到他是如何从古希腊语文学和古典考古学转向了埃及学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耐

人寻味的德语词,称自己是“滑落到”(rutschen)埃及学这个“兰花学科”(Orchideenfach,稀有但无用)的。不过,阿斯曼对音乐的热情持续到了生命的终点,家里的钢琴不仅让他从紧张的学习和学术活动中得到了缓解,也帮助他更好地理解与阐释与古埃及相关的音乐作品。

值得强调的是,阿斯曼把文化记忆理论推广到音乐领域。他从效果史和接受史两个角度探讨了古埃及与欧洲尤其是德语国家音乐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魔笛:歌剧和密宗》(2005)、《亨德尔清唱剧〈以色列在埃及〉》(2015)等。阿斯曼还有多部采用文化记忆理论解读托马斯·曼作品的论著,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托马斯·曼与埃及:约瑟夫小说中的神话与一神教》(2006)。

2020年,阿斯曼出版了篇幅达272页的著作《葬礼与艺术:贝多芬的〈庄严弥撒〉作为礼拜仪式》,让人不禁想到莫扎特临终前创作的《安魂曲》。贝多芬在一稿中写下了“愿它重新引发灵感”的题词。或许可以说,阿斯曼真正理解了贝多芬创作《庄严弥撒》的初衷和他当时的心境。阿斯曼毕生研究记忆、回忆和文化记忆的问题,更为经典的是,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最早是从古埃及人的坟墓入手的。在题为《论伊西斯和奥西里斯神话》的论文中,阿斯曼做了如下的论述:“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古埃及人的墓碑和墓室墙壁上经常有墓主人与其妻子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的浮雕,丈夫把一只手臂放在妻子的肩膀上,妻子则用一只手抚摸丈夫的后背或腰。假如我们归根结底把古埃及文化视为对死亡的一种抗议和征服死亡的一项工程,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对被死亡破坏的墓主人与其妻子、家人的关系及其社会网络进行修复。”在授予阿斯曼夫妇德国书业和平奖的典礼上,著名文艺理论家贡布雷斯特引用了阿斯曼题为《古埃及人的死亡镜像和死亡仪式》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因为懂得太多,人从自然界的秩序中跌落下来。他不得已建造了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世界,它的名字就叫文化。文化源自人对死亡及其不可避免性的认知,文化的目的和功能在于,建构一种时空框架,以便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设想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界限以外的世界,并设法无限延长自己为此行动、想象和筹备的线条。”

愿他在由自己毕生心血建构的文化记忆的时空永驻!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魔笛:歌剧和密宗》(2005)



▲ 《托马斯·曼与埃及:约瑟夫小说中的神话与一神教》(2006)